

被忽视的登陆点： 施拉姆、余也鲁广州讲学35周年的历史考察

罗昕

摘要

1982年4月，施拉姆、余也鲁访问中国大陆的“破冰之旅”，翻开了中国传播学的重要一页。在这段重要的讲学路线图中，广州作为施拉姆、余也鲁的登陆点，由于假想的学科限制，一直以来被大多数新闻学、传播学文献所遗忘。需要澄清的历史事实是，没有广州的讲学活动就没有北京、上海的讲学活动。施拉姆、余也鲁登陆广州，缘起于国内电化教育国外考察团的一次邂逅，体现了广州作为改革开放前沿的胆识与包容。他们在广州7天的讲座内容，为中国传播学发展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遗产。施拉姆、余也鲁广州讲学，对带动讲学路线一路北上，促进传播学本土化发展，推动传播学人才培养，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关键词

施拉姆、余也鲁、登陆点、传播学

作者简介

罗昕，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电邮：luoxin89@163.com。

The Neglected Landing Point: the Historical Reconsideration on the 35th Anniversary of Schramm and Yu Yelu's Lectures in Guangzhou

LUO Xin

Abstract

Wilbur Schramm and Yu Yelu, who visited China in 1982, set an important millstone for Communication Studies in China, in their “ice-breaking journey”. Guangzhou, the first landing point in this important lecture roadmap, has been forgotten by a majority of bibliographies in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because of an imaged fence between disciplines. The

historical fact must be clarified that there would be no lecture in Beijing or Shanghai without Guangzhou's lectures. Schramm and Yu Yelu's landing on Guangzhou could date back to a time when Chinese delegation of electrified education began their investigation trip aboard, which reflected the spirits of courage and inclusion in such a frontier of Chinese Reform and Opening. In the 7-day lectures, Schramm and Yu Yelu have left us with a valuable ideal heritag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ommunication. Schramm and Yu Yelu's landing on Guangzhou is of many historical significances such as marching their journey to the North,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communication localization, and cultivating more and more intellectuals for Communication in China.

Keywords

Wilbur Schramm, Yu Yelu, the landing point, Communication

Author

Luo Xin is a professor at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Ji Nan University.
Email: luoxin89@163.com.

1982年4月,传播学之父施拉姆(Wilbur Schramm)与他的学生余也鲁教授首访中国大陆,是中国传播学发展史的重要里程碑。在这段重要的讲学路线图中,一个需要澄清的历史事实是,施拉姆、余也鲁的登陆点不是北京、上海,而是广州。没有广州的讲学活动就没有北京、上海的讲学活动,广州是施拉姆在华讲学活动中迈开的第一步。他们在广州讲学活动并非短暂停留,而是连续进行了七天的讲学。但为何这个重要的登陆点却被大多数新闻传播学文献所忽视?主要原因来自两方面:一是当时新闻传播学者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由于讲学地点是远在广州的一所当时不太知名的大学——华南师范学院(1982年10月改为“华南师范大学”),讲学对象是电化教育工作者,因而当时并没有引起新闻传播学者的关注;二是广州讲学活动的组织者本身也没有对这段历史及时地进行记录宣传。在可搜集的学术期刊上,较早零星提及这段历史的时间是1995年,组织者之一的李运林在《电化教育》的一篇文章中用两句话简单介绍了施拉姆这次广州之行的意义,之后他在《电化教育研究》的多篇纪念电化教育(教育技术)专业发展史的文章中都简要提及到这段历史。

可见,施拉姆广州讲学活动的过往影响仅仅局限在电化教育(教育传播学)领域,在传播学领域的重要价值与影响并没有得到更大的挖掘。总体看,施拉姆广州讲学活动的被忽视,实质来源于新闻传播学与电化教育学(教育传播学)之间的学科隔阂。在纪念施拉姆、余也鲁在华讲学35周年之际,重新探寻两人在广州讲学的登陆点,打破学科之间的藩篱,重新评估这段讲学活动的历史意义与研究价值,进

一步发掘两人对中国传播学发展的历史遗产，有助于更清晰地重现传播学中国化之路上的重要转折点，从而在更广阔的学科交叉融合视阈中推动中国传播学研究在各个学科领域的蓬勃发展。

一、电化教育国外考察团：施拉姆、余也鲁广州讲习的历史缘起

正如余也鲁教授（2010:611）所说：“我要先讲这个访问团，是因为这次访问引发了宣伟伯和我1982年的中国之行。”文革结束后，教育领域受损最严重，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人才和师资严重缺乏。要在短期内提高教育质量、扩大教育规模、提高教学效率，就要重视电化教育工作。1978年3月，全国电化教育汇报会上，教育部副部长雍文涛指出：“电化教育涉及实现四个现代化……要学习国外先进经验，进行创新，下决心打这个硬仗。”（吴在扬，1994:94-98）4月，国务院召开全国教育工作会议，邓小平在讲话中两次提到电化教育，指出“要制订加快发展电视、广播等现代化手段的措施，这是多快好省发展教育事业的重要途径，必须引起充分的重视”“教育部和各地教育行政部门要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比如充分利用广播、电视，举办各种训练班、进修班，编印教学参考资料等，大力培训师资。”（吴在扬，1994：94-98）

为了了解、学习国外电化教育的经验教训，教育部1978、1979年两年内，连续派团考察国外电化教育工作。1978年，考察团先后考察了比利时、法国、日本、加拿大、英国等国家。1979年，教育部又组织了一个由各省（市）主管教育的副省长和教育厅厅长组成的代表团，到国外考察电化教育。当时广东省高等教育厅厅长林川同志担任该代表团团长¹。“他在考察中一直思考着一个问题，推行电化教育依据的理论基础是什么？在国外看了许多先进的设备与教学环境，但问题的答案一直没找到。”（李云林，2009）考察团回到香港参观香港中文大学传播学系时，系主任余也鲁教授作了为期半天的接待安排，“在会上简介了传媒如何用在教育上，从旧有的影音教学，到现代教育媒体，录音和电视，以及新的教学设计。又和大家分享了一点美国公开大学的经验，正要讲到卫星教学，已是午饭时刻。客人们决定取消下午的其他节目，把这个‘讲习会’继续下去。下午介绍了卫星教学，和媒体怎样广泛应用于课堂外的普及教育，基层农业训练和大众知识的学习。”（余也鲁，2010:611）到了傍晚，在听了余也鲁教授介绍的传播理论后，林川同志眼睛一亮，认为传播学正是电化教育所需要的基础理论。他在总结中只说了一句话：“时间太短，行程太紧，把余教授请到北京去”。回广州后，“他立即找了华南师范大学的

校长潘炯华和电教中心负责人李运林、李克东，向他们介绍出国的感受与收获，安排他们三人于1980年去香港中文大学拜会余也鲁教授，并代为邀请余教授来内地讲学。余教授欣然应允，并提出拟请他的导师美国传播学科创始人施拉姆同来。”

（李云林，2009）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施拉姆“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倡导媒介教学，为最早研究教育传播的美国学者。他所著的《大媒介与小媒介：教学工具与技术》（1973）是西方‘电化教育’理论与实践的总评。”（宣伟伯，余也鲁，1988:1）196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邀请他撰写的《大众媒介与国家发展》，大部分内容也涉及到媒介教学和教育传播的问题，如他把“作为教育手段”的媒介分为四代：“第一代媒介——海图、地图、图表、书写材料、展览、模型、黑板、示范、戏剧剧本等；第二代媒介——印刷教科书、教学参考书和测验；第三代媒介——照片、幻灯片、电影胶片、无声动画片、录音带、电影、广播和电视；第四代媒介——程序化教学、语言实验室、电子数字计算机。”（施拉姆，1990:148-151）他认为：“在缺乏教师、培训人员、辅导员的地方，媒介能够承担起相当大的教学量。”事实上，在他所有传播学研究领域中，从被引用次数看，有关媒介教育与教学研究的学术贡献与影响最大。余也鲁的弟子苏钥机（2012）通过SSCI数据库的数据分析（时间截止到2012年12月21日），发现在被引用的总次数（2585）中，著作《儿童生活中的电视》（1961）的被引用次数最高，达到513次，《大众媒介与国家发展》的被引次数排列第三位（188次），《大媒介与小媒介》的被引用次数也排列第5位（129次）。因此，传播学者不应忽视施拉姆在教育传播学的重要贡献。

二、登陆点的突破：施拉姆、余也鲁广州讲习的“破冰之旅”

中国大陆个别学者1950—1970年代曾经零星暂短地引介过有关西方传播学的相关知识。文革后，中国大陆新闻学界又开始恢复引介西方传播学。但那时引介西方传播学仍然具有一定的风险性，往往是从阶级批判的角度来看待，因为西方传播学被看作是西方意识形态的东西。如1978年7月复旦大学新闻系资料室编辑出版的《外国新闻事业研究资料》第1期，里面发表了主编郑北渭翻译的一篇传播学文章《公众传播》。为了防止被指责为“资产阶级观点”，他特别加了“编者按”，指出“‘公众传播’是资产阶级新闻学术语，曾译为‘公共传播工具’，是帝国主义时代垄断资产阶级控制的宣传工具及其职能的统称……。实质上是无政府状态的集团竞争的经济通过新闻手段的反映，是垄断资产阶级控制舆论，制造舆论，毒害群

众，奴役人民的宣传工具……”正如施拉姆《报刊的四种理论》的译者林珊教授所说：“我们是打着批判的名义引进介绍西方传播学一些论著。”（姜飞，2012）

当时国内不少人认为，施拉姆本人就是美国政府御用文人集团中的一员，“由于他深深地介入到美国政府在全球范围所发起的心理战中，他的许多研究工作具有深厚的美国政府部门、军事部门、情报部门背景。”（柯泽，2012）不少观点具有很强的意识形态色彩，如《报刊的四种理论》涉及到集权主义理论，他把前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统统列为集权主义国家。

应该辩证看到，施拉姆既是一个冷战色彩很浓，有着意识形态取向的传播研究者，又是一个关注现实社会发展、充满责任感的学者。事实上，施拉姆与中国有特别的缘分，“极其关心中国和这个拥有‘长春文化的国家’的前途”，“他是传播学大师级外国学者中对中国关注最多的一位。”（晓凌，1982）在其最得意的著作《传播学概论》的第一个附图就是汉字的变迁，书中列举的一些例证也涉及与中国相关的事件，如中印边界冲突，中国人如何用戏曲来传达政治信息等。他（1983: vi）在中译本序中说：“我们在西方的文化背景中学习科学研究方法与理论的人，看见中国长春的文化和她悠久的传（播）的艺术传统，总免不了会肃然起敬。”施拉姆1973年建立的夏威夷东西方中心传播研究所，是当时整理社会主义中国发展传播经验的重要园地。该研究所“超越了紧盯社会主义中国大众媒介的意识形态功能的冷战视角，组织了一系列聚焦传播与新中国社会变迁之关联的讨论”，“在他们看来，社会主义中国最显著的发展传播经验，是有效结合了传统人际传播和新兴的大众媒介，广泛动员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的国民参与到国家发展计划中来。”（刘兢，2013）1977年施拉姆访问香港中文大学，提出要发掘中国文化中的传播学遗产。1978年，施拉姆在香港中文大学任访问教授，开始热忱地推动传播学在中国的发展。他有一个他很喜欢的一个中文名字——“宣伟伯”。余也鲁教授是这样解释这一名字的来历的：“韦尔伯·施拉姆博士可称为美国宣传教育界的一位伟大的伯父，而且宣伟伯与韦尔伯又谐音，所以我们海外侨胞给他取了这样一个中国名字。”（龚文庠，2007）

那时中国大陆译介西方传播学的学术文献都得小心翼翼，要把传播学之父施拉姆直接引入到中国大陆来，显然是一个更加需要考量引进者和组织者胆识和智慧的问题。施拉姆、余也鲁广州站的重要组织者之一李运林教授回忆了当时邀请的艰难情况：“1982年4月施拉姆来广州，广东省有关部门经过了很艰苦的工作，因为在改革开放初期，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来中国讲学。这种情况也是为什么施

拉姆不是首先去北京、上海交流的一个原因。我们当时要请这么一个人过来不是那么容易的。但是广东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能够接受不同观点的人进来。此外，凡是有宗教背景的人也是不容易请进来的。我们都知道，施拉姆、余也鲁都是基督教徒。所以，他们能到广州来，体现了广州作为改革开放前沿的重要桥梁作用。而且他们当时来广州，我们是用一个很高的规格来接待，安排他们住在当时的中南局招待所——东山宾馆。他们来广州了，不是由学校安排，是中南局政府机构来做好接待安排的。但是学术报告是在林川同志的积极活动下在华南师范大学进行的。”²

时任广东高教厅厅长林川同志大胆开拓创新，勇于破除当时还禁锢在人们头脑中的禁区，可以说是直接引进美国传播学者的第一人，但他的历史地位似乎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提升。他首次将西方传播学理论用于中国的教育改革实践中来，有力推动了当年乃至之后几年国内学习讨论传播学的高潮。而施拉姆首先是为促进中国电化教育而来的，也从最初对中国传学的远距离关注到最终亲身登陆广州讲学。西学东渐，广州在中国传播学史上又一次领风气之先。

三、教育传播学的诞生：施拉姆、余也鲁广州讲习的主要内容

1982年4月，经过两年的教材准备以及多次往返香港和夏威夷，施拉姆、余也鲁终于成功登陆广州。4月21日开始，在华南师范大学的全国性“现代教育传播理论讲习班”上，作了为期七天的教育传播学术报告，全面介绍现代传播和媒体教育，第一次将传播理论系统性传入中国。来自全国电教界的300多位同行成了中国大陆第一批直接聆听传播学之父的学生。“美国的传播理论，经过一位行政官员林川厅长的重视与努力，首次从美国引进中国。”（李运林，2009）但由于“西方在教育传播上40年的研究和实践，要在短短六天内作出全面的介绍，讲的人十分吃力，学的人因为大都没有社会科学的底子，又未接触到传播学，也是十分吃力。”（余也鲁，2010:612）“7天很忙的，上半天就讲，下半天就答问题，中午我们就商量要怎么样讲、讲什么东西。”（余也鲁，施清彬，崔煌芳，章琪琦，2012）

广州七天讲学中，施拉姆和余也鲁各负责三天，共七讲，提出了传媒教学的八个问题，到今天仍是教育传播学的有效指导原则。“七天中的七个报告均印发有中文的讲稿，并配有录像教材，内容十分丰富，效果很好。广东电视台还作了详细报道。”³这七篇讲稿加上余也鲁1983年在兰州的三篇讲稿，编成了一本小书《传媒·教育·现代化——教育传播理论与实践》，1986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

版。这七篇讲稿的主要内容包括怎样克服对教育科技的阻力、怎样选择教学媒体、教学软件制作的路线、介绍5个新事物传播的实验、介绍两个卫星教学实验、电视在现代化教学中的任务、现代远程教育的功能与问题（宣伟伯、余也鲁，1988:25—198）。

施拉姆、余也鲁当时提出的很多观点在互联网时代都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如他认为教学需要多种媒介来配合；混合使用媒介比只用一种媒介的学习效果好；混合适用媒介来配合教学工作，这种配组十分复杂，很难做到理想；将媒介与教学次序作最适当的配合，实际上困难很大。这种观点实际涉及到今天的“全媒体”、“融合媒体”概念。就新闻报道来说，事实真相的呈现需要多种媒体立体呈现以实现最佳传播效果，但如何选择不同的媒体进行最佳配合，以及如何在各种媒体上对新闻信息资源做最适当的配合，又是实践操作中的难点。

又如施拉姆、余也鲁提出了不同的媒介类型。从制作成本看，分为大媒介和小媒介，大媒介指那些成本高而且结构复杂的媒介，如电影电视、电子计算机辅助教学系统等；小媒介指构造比较简单、成本比较低的媒介，如透明投影胶片、幻灯片、无线电广播等。从媒介接触面看，分为宏媒介和微媒介，宏媒介指那些接触面广泛，可以同时达到大量使用者的媒介，如无线电广播、闭路广播电视、无线电视等；微媒介指在同一时间只可以和有限使用者接触的媒介，如幻灯片、电影、电子计算机辅助教学等。尽管这些分类如同麦克卢汉“冷热媒介”分类一样让人难以捉摸，但已经清楚预见媒介发展的趋势，即人类传播一方面走向“大”而“宏”的传播状态，如互联网、智能手机、VR技术、无人机；另一方面也越来越走向“小”而“微”的传播状态，如微信、微视频、微电影。

四、中国传播学发展的转折点：施拉姆、余也鲁广州讲学的历史意义

广州作为施拉姆、余也鲁访华的登陆点，在中国传播学发展史上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一）带动讲学路线一路向北

施拉姆、余也鲁访华的“破冰之旅”，首先是在广州打破了“暗潮汹涌”上的冰盖，给当时全国的传播学界打开了一个窗口。中国电化教育领域率先把施拉姆引入到广州，成为施拉姆登陆中国大陆的重要突破口，使得西方传播学在中国大陆新闻学领域的一个敏感禁区，迅速从广州向北京、上海两个新闻学研究的重镇开放。复旦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所知道施拉姆将在广州讲学的消息后，来信邀请顺道访问上海和北京。正如新中国电化教育奠基人南国农教授所言：“我觉得一个历

史事实首先需要澄清,就是我看到有些材料说宣伟伯到中国来,没有说到先是在广州讲学的,有的人说是人民日报或复旦大学请来的。事实上,施拉姆到中国来,首先是华南师范大学先请来的。”⁴

从广州到上海再到北京,随着施拉姆讲学路线逐渐向中国政治中心的迈进,传播学被赋予西方意识形态的浓重色彩逐渐褪去,国人也越来越意识到传播学对社会主义建设也有积极作用。施拉姆在北京讲学期间还受到当时负责财经与科技事务的薄一波副总理的接见。据报载,“薄一波副总理对中国的传播学起源以及传播学的作用非常感兴趣,以至于夜不能寐,半夜还打电话给安岗同志,请他把自己对中国传播学起源的见解转告施拉姆博士和余也鲁教授。”(晓凌,1982)施拉姆的北上广之旅,使得传播学研究在上世纪80年代掀起了一个高潮。同年11月,中国社科院新闻研究所主持了第一次西方传播学的座谈会(即“第一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提出十六字方针的研究纲领——“系统了解、分析研究、批判吸收和自主创造”。

“直到80年代末,全国传播学教学、研究,呈现一派欣欣向荣景象。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不能不归功于施拉姆的来华访问。”(徐耀魁,2012)

(二) 推动传播学本土化的发展

施拉姆、余也鲁在广州讲学活动,本身就是一次传播学用于中国电化教育领域的本土化实践。这是首次比较系统地将传播学理论传入中国内地,既为电教事业发展找到了理论依据,也对中国教育传播学发展产生深远影响。教育传播学的诞生,是传播学中国本土化的一个典型范本。“这7天的讲学,催生了中国一个新的学科——教育传播学。教育传播学的概念是在美国20世纪60-70年代初出现的,但是它成为一门学科是在中国诞生的。这门学科的诞生,宣伟伯和余也鲁是功不可没的。最早的教育传播学理论框架是他们在广州讲学内容中建立起来的,但是中国学者在这门学科的建设发展中做出了不少贡献。”⁵

施拉姆和余也鲁用中文在高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专著《传媒·教育·现代化——教育传播的理论与实践》(1988年),形成了教育传播学最初的理论框架。这本书的出版,是我国传播学发展史中具有重大意义的大事,也是施拉姆、余也鲁此次广州讲学活动的重要学术贡献。“从该书的作者简介可以发现,该教育传播著作并没有在国外、境外出版。他们出版了很多专著,但教育传播理论方面的专著还没有在国外与境外发表过。”(李运林,李克东,徐福荫,2012)。施拉姆、余也鲁广州讲学,对当时活动的组织者、见证者及其后继者产生了重要影响,他们在介绍传播学、积极探索传播学本土化特别是教育传播学方面做出了积极的努力,20世纪80年代后期推出了中国早期的一批有关传播理论、传播研究方法的教材。这批学术共同

体的形成,使得广州成为教育传播学研究的重镇。

(三) 开启传播学人才培养

施拉姆、余也鲁在广州的七天讲学,仅仅是他们在中国开展传播学术活动的一个序曲,他们紧接着还帮助中国培养传播学人才,为建立传播学科专业等做了大量工作。有些是他们共同组织的活动,有些是余也鲁具体去执行的事情。1983年2月至7月,余也鲁筹集经费,邀请当时活动组织者作为访问学者前往香港中文大学,由余也鲁组织并主讲研修几门课程:传播理论、传播研究方法、教育电视和计算机辅助教学。1985年、1987年相继派出多名骨干教师到香港中文大学继续研修相关课程。(李运林,李克东,南国农等,2013)1983年,余也鲁还协助厦门大学首创以“传播”命名的新闻传播系,协助华南师范大学创办新中国第一个电化教育专业。

余也鲁还在华南师大、江西师大、厦门大学等几所院校设立了“三八传播奖学金”,专门奖励在传播学科中学习成绩优异的女学生;安排了多名美国传播学专家来华南师大、江西师大担任教学工作,并面向全国举办研讨班;多次筹集经费送国内十多名青年学者到美国、澳大利亚攻读传播学的博士学位;多次安排国内学者到国外进行学术交流。(李运林,李克东,徐福荫,2012)施拉姆在给研究生上课的时候,最爱引用的一句名言是“把火炬传下去”,他的意思就在于激励他的学生应当投身于传播学的研究,把它当作自己终身的事业,世代地传下去。“施拉姆虽然不是中国传播学薪火相继的‘点火者’,他的到来却成为至关重要的‘助燃剂’。”(刘海龙,2007)作为施拉姆弟子的余也鲁已经为中国传播学研究和教育作出了积极贡献。我们要通过一代代传播学人才的培养,把他已经在广州举起的火炬传递下去,让中国传播学不断发扬光大。

结语

正如黄旦教授(2012)所言:“我不敢说绝对是施拉姆的访华直接推动了中国的传播学”“也许我们可以这么说,施拉姆的访华对我们重视和了解美国的大众传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我觉得这个结论应该是可以下的。”在纪念施拉姆、余也鲁广州讲学35周年之际,我们重新关注并钩沉这段历史,是因为它对我们当下研究仍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第一,传播学研究需要大力推动具体领域的本土化研究。施拉姆不仅在大众传播学领域创造了多个第一的杰出贡献,而且引领和促进了中国大陆一门新兴学科——教育传播学的诞生。这个独特的最大的学术贡献,是有世界意义的。施拉姆、余也鲁在广州七天的讲学报告,形成了教育传播学最初的理论框

架,是西方传播学理论在中国本土化过程中的一个范例。“传的艺术已深潜中国文化中,流漾在中国人的血液里,只差作系统性的与科学性的发掘与整合。现在该是开始的时候了”。(黄旦,2012)第二是传播学研究要适应国家发展的需要。传媒和国家发展是施拉姆的研究专长之一。施拉姆的广州讲学活动,将他的研究专长在中国这片古老土地上得到了充分发挥,适应了中国大力发展教育事业的迫切需要。传播学研究要在国家发展中不断与时俱进,从而推动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传播学理论体系。第三是传播学研究要打破学科之间的壁垒。中国传播学研究要在不同学科交流互鉴中发展壮大,在全球传播学研究的知识版图中体现中国学术共同体的贡献度。施拉姆将传播学比喻为“公共汽车站”,越来越多的学科在研究传播现象或问题。如何打破学科之间的壁垒,形成传播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充分对话,是推动建立中国特色传播学的重要议题。

(责任编辑:林羽丰)

注释 [Notes]

1. 林川(1918-2014年),2012年12月访谈时已近94岁,耳朵和眼睛都不好,但他对当时邀请施拉姆、余也鲁的整个过程记忆犹新。2014年4月8日在广州逝世,享年96岁。当时的访谈录像成为珍贵影像。
2. 笔者对1982年施拉姆广州讲学活动的组织者李运林教授的访谈录像资料,2012年12月21日上午。
3. 笔者对1982年施拉姆广州讲学活动的组织者李运林教授的访谈资料,2012年12月21日上午。
4. 5. 笔者对1982年施拉姆广州讲学活动的见证者、新中国电化教育奠基人南国农教授(1920-2014)的访谈资料,2012年12月21日下午。2014年9月27日逝世,享年95岁。当时的访谈录像成为珍贵影像。

引用文献 [References]

- 黄旦(2012).中国传播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从施拉姆访华说起.“施拉姆访华30周年纪念暨传播学在中国的发展”学术研讨会的主题发言.12月24日,广州.
- [Huang, Dan (2002). The history and current situation of Communication Studies in China: from Schram's visit to China. The keynote address at the Conference of the 30th Anniversary of Wilbur Schramm's Visit to China Along with the Developments of Chinese Communication Studies. Dec.24, Guangzhou.]
- 龚文彦(2007).论施拉姆与中国传播学.《国际新闻界》,32(10):25.
- [Gong, Wenxiang (2007). Wilbur Schramm's influence upon Communication Studies in Chin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32 (10) :25.]

姜飞 (2012). 中国传播研究的三次浪潮——纪念施拉姆访华30周年暨后施拉姆时代中国的传播研究.《新闻与传播研究》, 19 (4) :21.

[Jiang, Fei (2012). Three waves of Communication Studies in China: On the 30th anniversary of Wilbur Schramm's visit to China along with the problems and directions of Chinese Communication Studies in the post-Schramm era.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19 (4) :21.]

柯泽 (2012). 施拉姆在美国心理战中的角色扮演以及传播思想. “施拉姆访华30周年纪念暨传播学在中国的发展” 学术研讨会论文. 12月24日, 广州.

[Ke, Ze (2012). Wilbur Schramm's role in the American Psywar and his thinking of Communicatio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of the 30th Anniversary of Wilbur Schramm's Visit to China Along with the Developments of Chinese Communication Studies. Dec.24, Guangzhou.]

李运林 (1995). 论电化教育发展与电化教育专业建设.《电化教育》, (3) :2.

[Li, YunLin (2009). On the development of E-education and the specialty construction of E-education, *E-education*, (3) :2.]

李运林 (2009). 教育传播研究: 重要性与新领域.《电化教育研究》, 30 (3) , 5.

[Li, Yunlin (2009). Research on Education Communication: importance and new field. *E-education Research*. 30 (3) :5.]

李运林, 李克东, 徐福荫 (2012). 我国教育传播理论的建立与发展——纪念宣伟伯、余也鲁来华南师范大学讲学30周年.《电化教育研究》, 33 (11) :12-13.

[Li, Yunlin, Li, Kedong, Xu & Fuyin (2012). The establishment and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Communication Theory in China: memorizing the 30th anniversary of Wilbur Schramm's visit to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E-education Research*, 33 (11) :12-13.]

李运林, 李克东, 南国农等 (2013). 协同创新30年——纪念华南师范大学创办新中国第一个电化教育专业 30周年.《电化教育研究》, 34 (11) :7.

[Li, Yunlin, Li, Kedong, Nan, Guonong, ect. (2013). 30 years of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memorizing the 30th anniversary of the first Education Communication established by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E-education Research*. 33 (11) :12-13.]

刘海龙 (2007). “传播学”引进中的“失踪者”: 从1978年—1989年批判学派的引介看中国早期的传播学观念.《新闻与传播研究》, 14 (4) :30.

[Liu, Hailong (2007). The absence of critical theories in Chinese introduction of western Communication theories in the early period.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14 (4) :30.]

刘兢 (2013). 施拉姆的遗产: 1970—1980年代夏威夷东西方中心传播研究所的中国传播研究.《文化与传播》, 2 (2) :1-3.

[Liu, Jing (2013). Schramm's heritage: Chinese Communication Research in Communication Institute of East and West Center during 1970-1980. *Culture & Communication*, 2 (2) :1-3.]

施拉姆 (1990).《大众传播媒介与社会发展》(金燕宁等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 [Schramm (1990) *Mass Communication Media and Social Development (Trans.)*. Beijing: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 苏钥机 (2012). 从引文分析看施拉姆的学术贡献和影响. “施拉姆访华30周年纪念暨传播学在中国的发展”学术研讨会主题发言. 12月24日, 广州.
- [Su, Yaoji (2012), Schram's academic contribution and influence from citation analysis. The keynote address at the Conference of the 30th Anniversary of Wilbur Schramm's Visit to China Along with the Developments of Chinese Communication Studies. Dec.24, Guangzhou.]
- 吴在扬 (1994). 《中国电化教育简史》.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 [Wu, Zaiyang (1994). *A Brief History of Chinese Audio-Visual Education*. Beijing: Higher Education Press.]
- 晓凌 (1982). 他们精心治学——余也鲁教授陪同宣伟伯博士在京访问的日子. 《新闻学会通讯》, (14):23.
- [Xiao, Ling (1982). They have rigorous scholarship: the days when Professor Yu Yelu visited to Beijing with Dr. Schramm. *News Society Newsletter*, (14):23.]
- 徐耀魁 (2012). 施拉姆对中国传播学研究的影响——纪念施拉姆来新闻研究所座谈30周年. 《新闻与传播研究》, 19 (4):13.
- [Xu, Yaokui (2012). Schramm's impact on Chinese Communication Research: celebrations of the 30th anniversary of Schramm's visit to Institute of Journalism.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19 (4):13.]
- 宣伟伯 (1983). 《传学概论——传媒·信息与人》(余也鲁译). 香港: 海天书楼出版社.
- [Schramm (1983). *Introduction to Communications: Media • Information and Human (Trans.)*. Hongkong: Rock House.]
- 宣伟伯, 余也鲁 (1988). 《传媒·教育·现代化: 教育传播的理论与实践》.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 [Schramm & Yu Yelu (1988). *Media • Education • Moderniz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of Educational Communication*. Beijing: Higher Education Press.]
- 余也鲁 (2010). 传播学及“中国传”在中国破冰之旅. 载于王怡红, 胡翼青 (主编), 《中国传播学30年 (1978-2008)》.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 [Yu Yelu (2010). Communications and the ice-thawing trip of Chinese Communication Research. in Wang Yihong & Hu Yiqing ed., *30 Years of Chinese Communication Studies*. Beijing: Encyclopedia of China Publishing House.]
- 余也鲁, 施清彬, 崔煌芳, 章琪琦 (2012). 中国传播学研究破冰之旅的回顾——余也鲁教授访问记. 《新闻与传播研究》, 19 (4):6.
- [Yu Yelu, Shi Qingbin, Cui Huangfang, & Zhang Qiqi (2012). Reviewing the ice-thawing trip of Chinese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 visit to Professor Yu Yelu.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19 (4):6.]